

*A Feather
On The Breath
Of God*

Sigrid Nunez

上帝吹
飘的
羽毛



*A Feather
On The Breath
Of God*

Sigrid Nunez

西格丽德·努涅斯

梁路璐 / 译

上帝吹
的羽毛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帝吹飘的羽毛/(美)努涅斯著;梁路璐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5

ISBN 978-7-5321-5645-0

I. ①上… II. ①努…②梁…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93227 号

A FEATHER ON THE BREATH OF GOD by SIGRID NUNEZ

Copyright © 2005 by Sigrid Nunez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Joy Harris Literary Agency,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3-688 号

出品人: 陈 征

策 划: 曹元勇

责任编辑: 曹 晴

封面设计: 胡 斌

上帝吹飘的羽毛

(美)努涅斯 著 梁路璐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鸿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75 插页 2 字数 101,000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645-0/I·4493 定价: 2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241533

第一部分

张





我第一次听父亲讲中文是在“康尼岛”^①上。我记不清自己当时几岁，但一定还很年幼。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我们全家还一起外出游玩。我们在木板路上散步时遇上了那四个中国男人。我母亲经常讲起这个故事，好像生怕我们忘了一样。“你们几个孩子不认得他们，我也不认得。他们是你们父亲的朋友，从‘唐人街’过来的。你们之前压根儿就没听说过中国人，更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你们站在那儿，嘴巴张得很大——我忍不住笑了。‘他们为什么唱歌？爸爸为什么要唱歌？’”

那四人中的一人给了我两个姐姐和我每人一张一美元的钞票。我把它换成了一角的硬币，然后跑去玩赢金鱼的游戏。每只小鱼碗里都有一条橘红色的小鱼游来游去，只要把手中的乒乓球投进其中的一只，你就赢了。一枚一角的硬币可以投三回。由于太激动，我总是慌慌张张就扔了出去，每次都那样。所有的硬币都用完了，我便哭着跑回大人们那里。给我美元的那个男人想要再给我一块钱，但被我们的父母拦住了。他就把自己正吃着的那袋子花生塞进我的手里，说都是我的了。

我再也没有见过这几个男人中的任何一个，也没有再听过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他们是我见过的父亲仅有的几个朋友。在那以后

① 位于纽约布鲁克林区南端，建有美国最早的游乐场，也是有名的海滩度假胜地。——如无特别说明，本书中的注释均为译注。

我还会听到他讲中文，只是很少很少了；在中餐馆，偶尔在电话里，还有一两次是他睡着时，再有就是他临终之时在医院里。

看来，这是真的了。他的确是中国人。在那之前我一直都不太相信这件事。

母亲总说他是坐着一条船来到美国的。他是坐着一条慢船从中国来的，她一直这么说，边说边笑。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认真的；如果是认真的，从中国来这件事有那么好笑吗？

从中国来的一条慢船。后来我才知道他不是在中国出生的，而是在巴拿马。怪不得我一直对他是中国人这件事将信将疑呢。他只能算半个中国人。

关于他的人生我实在是知之甚少。我们在同一所房子里生活了十八年，除此，我们几乎再无共同之处。我们的文化完全不同。说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也并不算夸张。我出生时父亲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将近三十年；但听他讲话你绝不会相信这一点。在我看来，他没能学好英语这件事一直都是任性使然。我母亲就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麻烦，抛开她的口音不提——她的口音也很重，却和他的大不一样。

“你知道，他从来不多谈他自己的事。他就是这样子，从来都没什么好说的，一向如此。沉默是金。跟文化有关吧，我觉得。”（我母亲。）

当我长到足以明白这句话的年纪时，父亲已经不怎么讲话了。

沉默寡言：人们说这是东方人的特质。但是，我不相信父亲一直都是我所认识的那个沉默孤僻的男人。想想那天在康尼岛上，他说起中文来是多么滔滔不绝。

我所知道的有关他的一切都是从母亲那儿听来的。不过，父亲还有很多事情她自己也不知道，另有不少她已经遗忘或者不确定，还有一些她绝不会提及。

六七八岁年纪时，我是个可怜兮兮的小女生，嘴巴总是裂口，母亲亲手缝制的旧大陆的花哨衣裳总是把我磨得难受；一个专横、躁动、淘气而又胆怯的小孩，爱耍小脾气，总爱哭鼻子。在学校里，操场上，或者看电视时，我听到了一些关于中国人的事情——很奇特，又觉得不可信。我去问父亲。他应该知道是不是那样的，我想知道，中国人是不是用棍子吃饭。

他耸耸肩，假装听不明白；或者沉着脸说：“中国人其他每个人一样。”

（“他觉得你是在取笑他。他总是觉得每个人都在取笑他。他看谁都不顺眼。你看他的行为举止，还以为他是个黑人呢！”）

其实，他说的是“米个人”。

中国人真的倒着写字吗？

中国人其他米个人一样。

他们真的吃狗肉吗？

中国人其他米个人一样。

他们真的都是共产党吗？

中国人其他米个人一样。

中国式水刑是什么样的？裹脚是怎么回事？中国官话又是什么？

中国人其他米个人一样。

他跟其他每个人不一样。

下面是一些少得可怜的事实。他于一九一一年出生在巴拿马的科隆。他的父亲来自上海。我尚能拼凑起来的信息是，祖父张是个做烟草茶叶生意的商人。他跟自己几个兄弟中的一个一起做生意，经常往来于上海和科隆之间。他有两个妻子，分别在这两座城市里生活；也许是因为照顾太均衡，两个妻子各为他生了两个儿子。我父亲卡洛斯出生后不久，他父亲就把他带到了上海，由上海的妻子抚养。十年后，我父亲被送回了科隆。我一直不知道个中原因。我听到的这个故事留给我的印象是，父亲是由于躲避某种危险才被送走的。的确，那时的中国处在一个动荡的年代，民国建立之后的十年，军阀的年代。如果日期无误，我父亲应该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年离开其成立之地上海的。不过，他离开中国是否与某些政治事件有关联却仍然不得而知。

父亲回到科隆一年之后，他的母亲去世了。我还是个孩子时听说她死于中风。过了些年，当我明白过来她死时才不过二十六岁，觉得不可思议。更难以想象的是分别许久的这对母子重逢时，他们很有可能说的不是同一种语言。另一个半巴拿马血统的儿子阿方索，也许和我父亲一起被送了回去，也许从未离开过科隆。他

们的母亲死后，两个男孩由他们父亲的兄弟兼生意伙伴米叔叔代为照料。米叔叔似乎住在科隆，并且有自己的一大家子人。

祖父张，他的中国妻子，以及他们的两个儿子留在了上海。据说他们均死于日本人之手。那一定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事。我父亲那时候应该年近三十或者三十出头了，但至于他是否在他的那些上海亲戚死之前跟他们见过面，我一无所知。

我父亲十二三岁时跟着米叔叔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我相信只有他们两个来了，把家里其他人都留在了科隆。大约在第二年的某个时候，我父亲被布鲁克林的一所公立学校录取了。我记得那时候曾无意中翻起过他的一个笔记本，看到封皮上面写的名字吃了一惊：查尔斯·西普里亚诺·张。据我所知，那既非他的名，也非他的姓；我也从未听说过那个中间名。（很难相信我父亲在上海度过他的童年时曾叫做卡洛斯；他甚至不能用西班牙语正确地发出这个名字的音。因此，他一定还有一个中文名字。尽管我的家人并不知道这个名字，他也许会在中国人中间用到它。）

二十年过去了。我所知道的关于父亲这部分人生的全部内容不过是他在纽约非法居住着，大半时间在“唐人街”度过；他在那里的许多餐馆工作过。之后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应征入伍。他在部队里最终成为一名美国公民。他又开始把自己叫做卡洛斯，而不再叫做查尔斯了；成为公民后，他放弃了自己的父姓，用起了母姓。为什么一个以中国人自居的人，一个一直生活在中国人中间、几乎不会讲西班牙语的人，一个对自己母亲知之甚少的人，会在人至中年时作出这样一个决定？这是我父亲身上众多神秘之处

中的一个。

我母亲有她的解释。“你知道，阿方索是巴拿马公民，他随了他母亲的姓。”（当然，那是为了符合西班牙的文化传统。）“他是那家子人当中唯一还活着的你父亲的亲人——其他人都死了。你父亲想要跟他兄弟同姓。还有，他觉得在这个国家里用一个西班牙姓能更好地与人相处。”我认为这解释不通。二十年来，他在“唐人街”一直被叫做张，如今，怎么突然又想起自己的拉美裔身份了？

在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中，父亲舍弃自己中国姓氏的原因被归结于为他办理公民身份手续的公务员。这个解释似乎还算合理，因为当时对中国人的移民限制还未撤销。但我不能排除更改姓氏是源于父亲和这位公务员之间的误会这种可能性。我父亲是个经常醉酒迷糊的人，尤其是在跟官员打交道时，他总是听不太懂对方的话，也很难用英语把自己的意思说明白。我可以想象，他不仅在头脑极不清醒时犯下了这个错误，而且由于自己的怯懦，事后也没有去更正它。

无论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我确信我都已经无法去了解了。我非常明白，改用西班牙姓氏给父亲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困惑；我也经常自问，如果他一直姓张的话，我自己的生活又会有哪些不同。

从此往后，故事似乎变得愈加清晰了。

我父亲跟随着第一百步兵师上了战场，在法国和德国打仗；

欧洲胜利日^①之后，他驻扎在那个德国南部的小镇，在那里，他与我母亲相遇了。他三十四岁，而她才刚满十八岁。她不久便怀孕了。

这里可以尽情猜测。他们是如何交流的？她在学校里学过一点点英语。他学过一点德语。他们彼此间产生的误解一定比理解要多得多。或许，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在我父母结婚之前，我的大姐姐已经两岁了，而我另一个姐姐也已在孕育之中。（我和我的姐姐们直到二十几岁才知道了这件事。）

在我三岁之前他们就已经有了两次长时间的分离。

“我真应该嫁给鲁道夫！”（我母亲。）

一九四八年。父亲带着他的妻子和大女儿回到了合众国。这次，一切都彻头彻尾地变了。这是一个不一样的美国了：成了美国公民，有了合法工作，也有了自己的家。他不再去“唐人街”喝酒赌博直到深夜了，工作不再一份接一份地换，挣的钱刚够糊口，也不再睡在朋友家的地板上或是餐馆厨房的架子上了。多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开支：租房花销、婴儿的小衣服、缴税、保险费、专用于孩子们教育的银行存款账户。他尽了自己的全力。他在福特·格林住宅区^②租了一间公寓，离他在富尔顿大街做服务生的餐馆不算太远。有些个夜里，餐馆打烊之后，他清理完了所有的桌子和盘子，便留下来赌博。之后他迂回着回到家，一个全无睡意的妻子在等着他，闻着他口中的威士忌味儿，对他输了还是赢了毫不关心。

① 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纳粹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美、英、苏协商后将五月八日确定为“欧洲胜利日”，这一天标志着欧洲战场全面停战。

② 由地方政府出资建造并控制的供给贫困家庭居住的住宅区。

就这么点钱——把其中任何一点拿去赌博都是一种罪过。她的英语好些了(“不用感激他!”),不过,就她要说的话而言,她并不需要多少词汇。她很痛苦。她恨美国,做梦都想回家去。那个三岁的孩子有点奇怪:她很少笑;她在杂志的每一页上抓来抓去,像一只猫。一岁大那个常常腹绞痛。更令母亲感到恐惧的是,她又怀孕了。她尝试过流产,可没成功。我出生了。说到那次去流产,她跟我父亲商量过吗?大概没有。如果商量过,我想我猜得到他会说什么。他会说:不行,这次准是个男孩。跟大多数男人一样,他想要个儿子。(全部是女孩——满屋子全是女人——中国男人的噩梦!)如果有个儿子的话,他也许就会开朗一些。也许他会教儿子学中文。

他找到了另一份工作,在一家大型公共健康服务医院的厨房刷盘子。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退休,最终升职为厨房监事。

他把家搬到了另一个住宅区,在城外,新建的,更干净,也更安全。

他一直都在工作。周末,他从医院里下班,又去一家中餐馆或另一家服侍客人进餐。大多数节假日他都在忙碌,从不休假。偶尔闲下来时,他会跑去赛马场,这让母亲十分震怒。但他并没有自我放纵。小小地赌一把,晚饭时喝上一点百威啤酒——一个人吃饭,我们其他人大概一小时前就吃完了(他总是工作到很晚。)——时不时地来杯苏格兰威士忌,抽支香烟——这些是他仅有的乐趣了。孩子们还很小的时候,偶尔会有外出游玩的时候。到“康尼岛”、“唐人街”、动物园。周日,有些时候他会带我们去看儿童日

场戏，每年去一次“无线电城”^①看圣诞节或者复活节演出。但是他和我母亲从来没有单独一起外出过，只他们两个——从来没有。

她的英语越来越好了，这让他看上去越来越糟。

他很少在家，但在我的记忆中他们总是在打架。

伤害并不需要太多词汇。

“蠢女人。疯婆子。说，说，说，说——永远都说不出啥东西来！”

“我真该嫁给鲁道夫！”

有一次，她往他脸上啐了一口。还有一次，她抓起一把面包刀，他费了好大气力才躲开她。

他们分床睡。

每隔几个月，她就会向孩子们宣布他们的关系结束了：我们要回“家”。（她的确带我们回过德国一次，那时我两岁。我们待了六个月。关于这段经历她总是闪烁其词。后来的几年里，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问她为什么我们不留在德国，她总是说：“你们这些孩子想要你们的父亲。”可是我觉得这不是真的。她很有可能意识到了自己回去之后无法生活。她从来都不能跟她的家人和睦相处。这时候，我觉得鲁道夫已经跟别人结婚了。）

即使打两份工，我父亲仍然挣不了太多钱。他挣的钱永远都不够买一幢房子。不过似乎身陷贫困带给母亲的压力更大一些。贫穷意味着你永远都不能松懈，意味着时时刻刻都得注重仪表。

^① 指纽约的“无线电城”音乐厅，世界著名艺术殿堂之一，位于纽约曼哈顿第六大道洛克菲勒中心。

只因为没有钱并不代表你要脏兮兮的。进到家里面看看：一切是多么干净整洁。看看孩子们：一尘不染。人们的确对我母亲称赞有加——擦得锃亮的地板，养育孩子的方法——这让她颇为自得。只是，贫穷依然令人疲惫不堪。

一天，一个为自己的孩子们忙得不可开交的女人敲了我家的门。母亲开门后，那女人却道了歉。“我以为——看到邮箱上的名字，我以为你们也是西班牙人呢。我的小孩想上厕所。”我母亲难掩她的不悦。她对自己是德国人很是自豪，即使是在战后那些年里，她也总是极力捍卫自己的身份。当人们——西语佬和中国佬——叫我们的名字时，她说：“你看见这个国家什么样子了？他们总说我们德国人有多坏，你要是德国人，没人会叫你的名字。”

她忍受不了我父亲的怪癖。他肌肉的颤搐说明他又遭遇了别人恶意的眼光。喝一杯还很烫的开水去治疗流感。他保存着几年前的《读者文摘》过刊以及某些特定年份发行的美元银币，相信有一天这些东西能值一大笔钱。她嫁给了一个多么迂腐的家伙！他说的英语简直能让她发疯。每每他听不懂别人跟他讲的话时（这种情况时常发生），他的反应不是“什么？”而是“哦？”。“哦？哦？你是个什么东西？猫头鹰？”她厉声对他喊道。

永无休止的吵闹和争斗。

我们这些孩子都盼着早点长大，上大学，结婚，搬得远远的。

阿方索和米叔叔呢？他们又怎样了？

“他们俩我都没见过。但是早些年里米总是给我们写信——

真讨厌。那时候他回了巴拿马。他是个十足的赌棍，他那几个儿子也一个德行。他们欠下的债实在还不清了，除了你父亲他们还能找谁？‘给我钱’米叔叔，我都这么叫他。‘想想我为你们做的一切吧。你们欠我的。’”（她从没听过他说话，却能模仿他的声音。）“你父亲攒了好几千块钱，他全给了米。我差点被气死。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我那时候怀孕了，只有一套孕妇装穿——就一套。米拿到了钱没多久就又写信来要钱。我告诉你父亲，要是再给他一分钱，我就走人。”

这番争吵不知怎的把阿方索也卷了进来。他似乎站在米那边。我父亲跟他们两人都断了来往。在我们离开布鲁克林几年后，“唐人街”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启事。阿方索和米在寻找我父亲的下落。我父亲说，他没有回应那则启事。他再也没有跟他们讲过话。（或许他撒了谎。或许他一直与他们保持着联系，偷偷地。我相信他大部分的人生对我们而言都是个谜。）

我从没见过父亲参军之前拍的照片。我不知道他小时候和年轻时候的样子。我也没见过他父母或他兄弟的照片，或者米叔叔的，任何其他亲戚的，或者他在科隆或上海居住的房子的照片。也许我父亲有曾属于他父母的物件，他年轻时候的信物或是纪念品，但我从没见过。关于他的青春，他只字未提。我父亲只跟我们说起过一件小事。在上海时他养过一只狗。当他动身前往巴拿马时，那只狗被带到码头上一同为他送行。我父亲上了船，狗开始嗥叫。他永远都记得那一幕：船离开了甲板，狗嗥叫着。“狗不傻。他知

道我再也不回去了。”

我们的房子里没有与中国有关的东西。没有用竹子或玉做的物件。没有漆器盒子。没有绘画卷轴或扇子。没有书法。没有刺绣丝绸。没有佛像。银器中间没有筷子，没有吃饭饭用的瓷碗或者茶具。没有中国茶叶，橱柜里没有人参或酱油。我父亲是唯一的中国货，坐在一群赫梅尔^①、布谷鸟时钟和高山风景画中间，宛如一尊佛像。我母亲认为这房子是她自己的，一说起来就是她的窗帘，她的地板。（经常发出警告：“别磨坏了我的地板！”）女儿们也是她的。她给每个人取了个日耳曼名字，他连念都念不出来。（“你们父亲叫你们什么？”那个问题——令我痛苦不堪的问题——贯穿了我的童年。）她想把自己的孩子们当作德国人来抚养，这部分源于她永恒不变的思乡之情。她为她们，甚至为她们的玩具娃娃缝制登德尔^②。她把她们的头发编成辫子，再像德国人那样把辫子紧紧盘在她们耳朵周围，像是防寒耳罩。她们会在平安夜打开她们的礼物，而不是在圣诞节的早晨。她们不庆祝感恩节。当然，她们也不会庆祝任何中国节日。中国新年时没有龙和鞭炮。圣诞节时餐桌上有红叶卷心菜和醋焖牛肉。想象一下我父亲用英语念醋焖牛肉时的样子。

有时候他会从“唐人街”把一些吃的东西带回家：炽红色的香肠，里面夹着星点肥肉，像是包埋起来的牙齿，鱼干，带豆酱馅儿的小圆面包——我们被逗得大笑，因为他把那馅叫做中式花森酱。这东西我母亲一点都不愿沾。（“天知道那究竟是什么。”）我们这

① 指姿态幽默、表情可爱的陶俑。

② 一种源于奥地利西部和意大利北部地区的少女紧身连衣裙。